

聖宋  
名賢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 中國史學叢書

吳相湘主編

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鈔本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全一冊）

編著者：宋葉魏齊賢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一八號

電話：三三〇九七・三三四五五・三四三四六

香港總經理：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  
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新臺幣九三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再版

6080-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在技術上也無法描摹。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影印本序

姚從吾

（從影印古書略談播芳大全文粹對宋代史研究的貢獻）

## 一 引言

民國五十二年夏天，住在台北市一部分對宋史研究有興趣的朋友們，想選擇影印宋代人的總集與別史，（意指總合性的文集與總合性的通史，如「三朝會編」、「繫年要錄」之屬。）讓大家各開一個值得影印的書目，作為選印的依據和參考。我當時兩次開了十種書，認為在此時、此地，這些書都是值得影印的。第一次的五種是：一、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五〇卷），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三、同上李氏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四、魏齊賢、葉芬合編的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五、杜大珪的名臣琬琰碑傳集（一〇七卷）。當時曾作簡單的提要與說明，現在擇要列舉如下。第一、這五種都是宋朝頂頂有名的總集或別史，三種曾列入廣雅叢書，現在已流傳不廣，值得優先加以影印。第二、趙宋一朝有關東都時代（北宋，西元九六〇——一二六）的幾部大書，像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

（二百五十卷），近年來都已經由臺灣省世界書局與文海書局影印了；那末與李氏長編相輔而行的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自應同時問世，方能相得益彰。第三、李心傳（微之，一一六六——一二四三），李燾（仁甫，一一一五——一一八四），與徐夢莘（商老，一一二六——一二〇七），是南宋初年並駕齊驅，鼎足而三的大史學家；又都是博識前言往事的愛國學人，終身盡瘁努力於國史的寫作，對國家的中興，表彰不遺餘力。就研究的重點說，李仁甫熟悉北宋掌故，長編五百二十卷，網羅宏富，前無古人；今輯錄本影印以後，大受歡迎，可見這一部史書所具吸引能力的強烈。徐商老留心宣和（徽宗）靖康（欽宗）炎興（高宗）三朝大變亂時代的公私文獻，會編二百五十卷的影印，公私稱便。李微之尤重視建炎紹興（高宗一朝）大亂後的中興；對於女真南侵中原士族文物的散而復聚，傳統儒家文化的危而得安，細心搜求，成書二百卷，在南宋三大史書中，地位尤為崇高。而且要錄與長編、會編，時代銜接，真是趙宋一代史學著述中的三鼎甲；只許鼎峙並美，不應二存一缺。我們既已影印李仁甫的續通鑑長編，徐商老的三朝會編了；怎能夠不及時影印李微之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呢？第四、李心傳氏的另一鉅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兩集，每集二十卷，復與會編要錄互為經緯。雜記載南宋高宗以

後朝政典章，具「高孝光寧四朝禮樂刑政之大端，兵農食貨之詳目」，「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所徵。」（四庫提要卷八十一評語。）那還能緩印麼？第五、至於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可以補充現存李仁甫的原書，它是從李氏長編原書中鈔輯出來的；記人述事，首尾完備，尤便閱讀。大家都知道現存李氏的長編，早已不是原書，而是輯自明朝的永樂大典。楊書錄自原書，自可以補充現存長編輯本的不足。且本書甚爲罕見，流傳甚少，自應及時影印，使與長編相得益彰。（它的特點下一節舉例時，再爲補述。）第六、說到魏齊賢葉芬合編的聖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雖流傳至今，仍是鈔本，却是一部別具風格，另有特色的一部佳書，值得早日影印問世。就書名「播芳大全」說，一看即可知道是通行於宋代中上流社會中的一部實用全書，內容包羅萬象；所收宋人小品文、手札小啓、美辭疏記，約略估計，即有四千五百篇之多。就中尤詳於士大夫階層的奉上慰下，酬酢應對。我們想明瞭宋朝社會（尤其北宋）繁榮興盛的若干實際情形，這一部應酬大全，自是不可不用的第一等好材料。第七、宋人長於寫作，名臣如范仲淹、韓琦、歐陽修輩，各人均擁有多彩多姿的神道碑、墓誌銘、家傳、行狀，且有一人具有以上各篇的。可是獨有鼎鼎大名宋代特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王荊公（安石），他在宋賢文集中，既沒有神道

碑、墓誌銘；也沒有行述，家傳；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主要原因，當然是他在政治上走了偏鋒，與當時的文士們搞的不好。所以一代碩傑的王安石，除了在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一篇列傳之外，祇有杜大珪的名臣琬琰集中，另有一篇長傳，可資比證。即此一端，杜氏琬琰集的值得寶貴，不也可略略窺見一斑麼？

我的意見，當時頗蒙友人的支持，並有意逐步採行。後來因為書不易借，款不易籌，台北市又沒有像從前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那樣規模比較完善的編譯所，與大規模影印圖書的機構；一旦着手影印大部名著，像「四部叢刊」，「四部備要」那樣有用的書，供給海內外留心中華文化歷史學人的參考使用；並且要作到「符合世界水準」，真是談何容易。這裏所說「世界水準」，也只是比較在學術界能佔得住的水準。(1)這一工作，至少要比二十年以前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有計劃選印善本古書，如四部叢刊第一、第二、第三諸集；和上海的中華書局精校排印四部備要，影印圖書集成等等作的一樣認真，或者更好。既不苟且，又不偷工減料；這樣慎選精印，多方為學術界文化界謀方便，纔真能符合現在文明世界的要求。如是，購買的人多了，紅利自在其中。(2)倘若再進一步：(a)圖書的後面增加人名、地名、專名引得；(b)添加有用的介紹與序跋，說明苦心選印訪求善

本的目的與經過。(C)再如日本友邦近日印刷的精美，圖表引得的爽神悅目。這樣使人一卷在手，心曠神怡；自然可望所印各書風行全世，賣者買者各償心願。可是工作能達到上述的種種，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談了一陣之後，也就算了。

## 二 對於影印古書的若干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這也應當是一般人的意見），彫板印書是不會再有的了。如是則大批影印舊書，在我國勢必盡量採用。利之所在，競求進步，止許日新月異，不會中止停頓。像從前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有正書局那樣的印刷廠、編譯所，自有恢復的必要。至於能否經營成功，那端在所影印的舊書，是否好書。其次是能否適應時代需要，知所選擇。同時翻印好的有用的古書以外，尚可選印專家已經譯過的世界名著。文學如莎士比亞、葛德等各類著作；歷史如吉本羅馬衰亡史，海格耳的歷史哲學與嚴復等人已譯成漢文的世界名著。至於小有才的書費，固然也可以想出若干手法，欺騙購者於一時；可是事實勝於雄辯，欺騙者的腿是短的（這是一句德國的俗語）。一旦西洋鏡戳穿，印了許多賣不出去的書。吃苦頭受譏笑的還是書賈自己。近來台北市有人影印元典章，仍用沈家本的舊刻本，又沒有兼

印新會陳氏的「元典章校補」。這自然是無遠見與不知學問爲何物的外行舉動了。這種翻板書流傳到了日本，即引起日本東北大學愛宕松男教授來信的譏誚。他說：「你們有故宮本『元刻元典章』爲什麼不影印？而仍用沈家本的本子來騙人，又沒有印元典章校補（十卷）；這不是浪費財力，存心欺騙，並且見笑方家嗎？」我只有回信告訴他：「您所買的影印元典章，我們台大文學院歷史系遼宋金元史的研究室從前就沒有買，後來因爲價廉也買一部供同學使用。這是短視的書賈，不知道選印板本，只圖目前小利的幼稚行爲，原不必大驚小怪。同時也怪您們貪圖便宜，願意上當。故宮的元刻本元典章豈是輕易影印，和如此廉價（一部只買二百多元台幣）可以購買得到的麼？」又有人影印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因爲李鴻章曾爲該書作序，就在書面上硬題是「李鴻章撰」，那更是荒唐可笑了。但是這兩件事也說明了目下出版界中的三種現象。第一、社會安定，文風日盛，國內外都需要大批中國的舊書（因爲這些都是原始的好材料）。有人影印流通，實得廣大社會的需要；即連板本不佳的沈刻元典章，影印出來即有銷路。第二、爲保持國際信譽與資金的有效使用，應請國內有卓識的出版界，重新擴建真能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去擔負舊書流通與文化交流的任務。第三、這些獲有專家

主持的新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應逐漸設立具有規模的編譯所，像從前商務印書館等在上海所設立的編譯所那樣。或因時代的進步，規模應更爲擴大；延攬學者專家，選拔近年台大、政大畢業的文法等科的碩士、博士，進行有計劃的編譯與整理的工作。有計劃的影印舊書，與已譯成中文尚可使用的世界名著（如上邊所說嚴又陵諸先輩的譯著等），以適應國內外學術界的需要。影印舊書，不應是只圖目前的小利，利用近代科學發達與化學技藝的進步，把機器買來亂印一陣而已。應當是第一步，選擇佳本，分別次第，酌加整理，分期出版。第二步，是有計劃的選印名家專集，依照時代（如北宋名家集等），地域（邊疆史地集），專題（如制度、社會、或文學、元曲之類），依次影印，便於各界使用。例如時代的劃分，應自北宋開始。因爲北宋是雕版創始的時代。宋以後又有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安定，方大量產生彫板印製的書籍，而且數量種類，逐漸加多。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依次下來，直到近代爲止，數量之多，實可驚人。應當大量影印，越多越好。同時再從宋代上溯、五代、唐代、隋代、南北朝；再由晉上溯到西漢、秦朝，書籍之外，兼印碑銘。其次是舊書影印的先後與性質的編排。我的愚見第一步先選印文史類的子與集，其次纔影印經部，（包括本文與解經文字，至於教學使

用，另當別論。）再其次再影印方志、族譜。即以宋代爲例，文史子集也應先印宋人的總集，別史（通史）；次印專集與小部頭的專史。這要看時代的需要與人手的是否足用，財力的是否充實，輕重緩急，不妨由國內外專家組成一個委員會集思廣益，從容商討；再由總攬全局的主持人計劃實施。這要看社會上的反應如何？那是沒有一定的成法的。

說到舊書的整理介紹，便利大多數人的使用，那就需要有計劃，有適當的內行人的主持，方能成功了。但選印介紹時，一定得知道各書的內容，與某書選印的理由。例如楊仲良的長編記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是楊氏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的原書中，分題鈔撮而成的。現在李氏長編的輯本，既由世界書局影印了，楊氏長編記事本末是否可以暫時緩印？若深知兩書內容的人，即覺着其實不然了。大家應當知道，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書曾經散失，現存的影印本雖也有五百二十卷，那是從永樂大典中重新輯錄而成的。李氏長編一書，實已殘缺不完，早非原典。茲舉一例，以見楊氏紀事本末的重要。

北宋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西元九六〇——一一二六）承接五代大亂之後，它的最大的貢獻，固在安內，也在攘外。北宋文治昌明，但對外武功不競；說到武力的強悍，實遠不及崛起東北遼河流域的契

丹人（遼朝）。幸而契丹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九〇一——九〇七——九二六），太宗耶律德光（九二七——九四七）以後，景宗與承天皇后傾向內地漢人文化，無意南侵。而北宋的太祖、太宗也能整軍經武，留心外交，達成兩國棄戰修好的任務。和好成功的關鍵，就是西元一〇〇四年宋遼兩國締結的澶淵盟約。從此北朝爲弟，南朝爲兄，北宋每年交付契丹三十萬兩正銀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後改爲五十萬（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作爲當年的經濟援助。實際是用以換取兩國間一百十六年（一〇〇四到一一二〇）共榮共存的和平。著者與日本學者田村實造教授，近年來均致力研討遼宋間澶淵盟約成立與長期奠定的原因。田村先生認爲北宋經援收了實效；我則認爲實得力於下列的六個因素。第一、遼宋兩國曾經由兩次大戰，方逐漸轉爲長期的對峙。（一次是九八八年的高粱河之戰，一次是九百九十年的遼宋岐溝關之戰；兩次宋朝均失敗了。）但北宋太祖太宗時代，國勢方盛，高粱河之戰，實宋兵北伐進圍幽州（北平），遼朝雖勝，只是驅走了北犯的宋人。第二次，北宋曹彬等岐溝關的潰敗，潘美等在大同方面的先勝後敗，雖仍是宋朝吃了大虧；但契丹承天皇后與聖宗皇帝，知道北宋地廣人衆，不可硬碰，所以並未主動南侵與報復。此後即形成對峙的局面，因之使雙方當局，漸漸有講和修好的轉念。

第二、這一修好的轉變由於宋真宗襄邸親信王繼忠的被俘與在炭山的「招親」，從內部引起了兩國當局雙方感情的溝通。第三、是曹利用通曉契丹話，能與承天皇后遼聖宗雙方坐下詳談，面對面交涉協商，消除了雙方的誤會，增加了南北兩國的好感。第四、契丹方面武力較優，但不幸主戰派蕭打凜臨時爲床子弩射死，無形中增加了和平的順利。第五、是主戰的宋太宗死了，真宗繼立，性復偏重守成；那末棄戰言和，始有可能。第六、是經濟援助的原因，也許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即是宋人每年贈幣三十萬所許條件的優厚，出於契丹方面意計之外，所以樂於接受。上述六個條件之中，仔細推究，曹利用的通曉契丹話（當時說是「能胡語」。）實與經濟援助同樣重要。因爲兩國相峙，可戰可和；和戰關鍵，操在中間人的手中。這批中間人最爲緊要；語言相通，彼此沒有隔閡，自可消除敵意，增進情感。否則，即枝節橫生，那就和好難期了。現在好了，曹利用能說契丹話，能和契丹國的承天皇后、遼聖宗直接商談了，這一點就我們今天對外交涉的經驗說，實在關係重大，不可輕輕放過。但是我們怎麼能知道曹利用會說契丹話呢？這就不得不歸功於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了。長編紀事本末在真宗澶淵盟約篇中，曾明明白白記載着：曹利用是宋朝北方沿邊的走馬承受，用現在的話說，他是北方沿邊的

聯絡情報人員，不但熟悉北方敵情，而且通曉胡話，能與承天皇后面對面辦理交涉、沒有隔阂。曹利用通胡語的報導，今天輯自永樂大典的李燾長編，對此點已找不到了；只有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把這件事記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台北市世界書局雖然已印了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而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因為記載了這些可貴的消息，仍然是值得將全書一百五十卷加以影印的。況且除了上述曹利用「通胡語」之外，尚有女真編上下兩卷及若干專題的報導等，也是現印輯本長編所沒有的。

至於說到校勘與整理，自是繁雜異常。但簡單扼要的整理，則應與影印同時着手，以期儘量減少使用者的困難。例如現存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刻在史學叢書中的本子，也是清乾隆時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並且書中女真人名，又於乾隆四年曾經竄改。阿骨打的四太子完顏宗弼，漢字原名本是兀朮，乾隆時改爲「烏珠」；左副元帥宗翰，原名粘罕，乾隆時改爲尼瑪哈之類。這些無裨研究，徒增糾紛；均應慎選通人，加以改正，不能貪圖小利，省事偷懶，一印了之。

### 三 播芳大全文粹的流傳與它一度西遊

#### 撒馬爾干的故事

現在言歸正傳，第一步要談談「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流傳的情形和關於它一度西遊撒馬爾干的故事了。說到北宋播芳大全文粹鈔本的流傳和有關的掌故，目下祇能就我所知道的，加以報導；我所不知，盼望專家將來加以補充。

(一)清四庫全書提要對於播芳大全文粹的品評 清乾隆時編印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播芳大全文粹的性質與板本的流傳，曾有簡明的介紹與品評；頗足以窺見這部書的由來與內容的概況。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七集部總集二，說：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一百十卷（此指四庫收錄本），宋魏齊賢，葉芬同編。按齊賢字仲賢，自署南陽鉅鹿人；芬字子實，自署南陽人。考宋南渡（一一二七）以後，鉅鹿，南陽皆爲金地；殆以魏氏本出鉅鹿，葉氏本出南陽，偶題郡望，非其真里籍也。」又說：「是書皆錄宋代之文，駢體居十之六七。雖題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實五百二十家，網羅可云極富。中間多採宦途應酬之作，取充卷數，不能一一精純。又仿文選之例，於作者止書其字，人遠年湮，亦往往難以考見。疑爲書肆刊本，本無鑒裁；故買菜求益，不免失於冗濫。……」

「然渣滓雖多，精華亦寓。宋人專集不傳於今者，實賴是書略

存梗概；亦鍾嶸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矣。故朱彝尊雖恨其蕪，終賞其博也。……」

這仍是舊日就選文章的觀點所下的評論。因為數量太多了，就很隨便的加以「本無鑑裁」，不免「失於冗濫」。或者還指爲「取充卷數，不能一一精純」。但是現在就材料的觀點說，上邊的一些話都用不着了。材料是越多越好，選擇的範圍是越廣博也越有價值。因為網羅宏富，宋人專集散失不傳的，也可從播芳大全集中，找尋到一部分，或一大部分。這豈僅是披沙揀金，實在是保全散佚，功德自是無量的。

(二)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對於播芳大全文粹鈔本流傳的考證  
現代國內藏書大家江安傅增湘氏著有藏園羣書題記，享有海內重名。傅氏對於播芳大全文粹曾作跋文一篇，載在題記的第八卷中，對於文粹鈔本的流傳，也有若干具體的考證。傅氏說：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一百卷，（指明代流傳的本子）明鈔、黑格棉紙。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語涉宋帝空格，是從宋本鈔出者。前有紹熙庚戌（南宋光宗年號，庚戌爲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南徐許仲啓序。書爲鉅鹿魏仲賢、南陽葉子實合編。首卷爲名賢總目（今本缺），凡五百五十卷。……按（傅氏）此書四庫總目提要爲一百十卷，此